

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写照

□ 孙杰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岁生日，董必武以一首《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称赞朱德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朱德作为答谢也依韵和诗：“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究，只见公仆不见官。”“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及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品格风范，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谁做官、怎样做官这个根本问题。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

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的13年，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延安的13年，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和崭新气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体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秉持与人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苏区作风，与人民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操场上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因执行烧炭任务而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作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时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高度评价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党的七大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党始终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中提出：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这不仅是对司法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其他部门干部的要求。

“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0年，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洋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并到重庆。蒋介石曾拨出8万元的专款，并联系30多个党政部门，组成了近5000人的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委员会。陈嘉庚得知蒋介石为了接待慰劳团特批了8万元的专款用于接待时，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对国家未来感到迷茫，他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登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1940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访问。在延安的时间虽短，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与国统区饿殍遍野的情况相比，这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个个脸上都充满了生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自己的事情干，纺织的纺织，种田的种田，这让陈嘉庚大为触动，看到了他理想之中的社会：“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没有上下尊卑，只有军民一心共同为了明天而努力奋斗的人们。”陈嘉庚受邀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见面。窑洞里只有一张方桌以及几张经过多次修补的木椅，毛泽东穿着粗布军装，与国民党高官的形象截然相反。毛泽东特地留下陈嘉庚共进晚餐，拿来款待他的只有两道青菜，还都是毛泽东自己种的，唯一称得上丰盛的还是邻居送的一大碗鸡汤。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看到了国共两党的差别，彻底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盛赞延安“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感慨：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料……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斯诺称其为“东方的魔力”，是中华民族“兴国之光”。

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党中央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包括延安在内的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延安五老”都亲自动手，种菜纺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干部和群众一样，住的是土窑洞，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野菜，穿的是粗布衣，没有油，没有纸，没有鞋袜，没有被盖。延安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一面生产，一面打仗。

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在上自总司令，下至每一个战士身上。1937年，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致函四川的亲属时指出：“我为了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來，公家及我均难招待。”为此，续范亭曾写诗赞颂朱德：“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为抗日确定教育方针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延安的卧室极为简单，没有橱柜，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平常只有简单的几件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制定了个人生产计划，决定当年的棉花、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给。林伯渠曾赋诗自励：“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贖。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陕甘宁边区因此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评价它“一没有贪污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当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各级领导人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而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3.5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种鲜明的对比，是陕甘宁边区政权能够赢得人民真诚拥护的根本所在，也是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

反“围剿”主战场的赣东丰碑——抚州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章志强

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022乡道中段，坐落着一座烈士陵园，一块高大的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陵园的中轴线上。纪念碑初建于1999年，后于2015年重修。纪念碑高19.49米，象征抚州城解放于1949年。整块碑由碑身和碑基组成，碑顶有一颗红色五角星，从上至下碑身逐渐拓宽，碑的正面写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碑基为六棱柱，侧面雕刻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无数抚州英雄儿女视死如归，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敢于牺牲的画面。碑基的西侧刻有《抚州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全文如下：

抚州，自古山川俊秀，人才辈出。自一九二六年抚州市第一个党支部——临川党支部成立以来，无数赣东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和幸福，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舍生忘死，英勇斗争。抚州是中央苏区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金资战役、黄陂东陂战役、广昌保卫战、高虎脑战役等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旗漫卷的烽火岁月，英雄的抚州儿女置生死于度外，七万余人踊跃参加红军，数十万民众英勇支前，赵醒侖、傅烈、周建屏、符竹庭等万余先烈血洒疆场，为早期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大批抚州优秀儿女为反抗侵略压迫，前赴后继，广泛参与全民族抗战，为争取建立民主新中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赞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仍有许多抚州儿女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抚州这块钟灵毓秀的红土地上，留下了成千上万烈士的忠魂，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青山埋忠骨，英雄留芳名。欣逢盛世，抚州市委、市政府重修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缅怀先烈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后人砥砺前行，为绿色崛起、跨越发展，建设幸福抚州凝聚强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再立新功。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抚州市委
抚州市人民政府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几百字的碑文是抚州革命史的缩影，也让人永远铭记为伟大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抚州儿女。立于碑前，敬读碑文，深感今日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无数前辈用鲜血铸就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照亮了我等后辈的前进之路。

前赴后继的英雄儿女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革命的烽火也在赣东大地燃起。抚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无数英雄儿女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赞歌，赵醒侖、傅烈、周建屏、符竹庭等烈士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22年，赵醒侖受中共中央委托，回江西创建党团组织。1925年，他任南昌特别支部书记，后任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主任。五卅惨案发生后，赵醒侖积极组织群众进行反帝斗争。1926年9月16日惨遭军阀杀害，年仅27岁。方志敏对其高度评价：赵醒侖在江西，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1926年10月，刘景宽、章应昌、许瑞芳等人组建了抚州第一个党组织——临川党支部。此后，领导抚州工农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随着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抚州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谢贤庆、邹渊等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抚州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并在各地建立红色政权。7万余名抚州儿女参加红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抚州人民也积极投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数十万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无数百姓自发组成游击队与日寇周旋，周建屏、符竹庭、周复、傅大庆等一大批抚州籍革命将士血洒疆场、以身殉国，为新中国的诞生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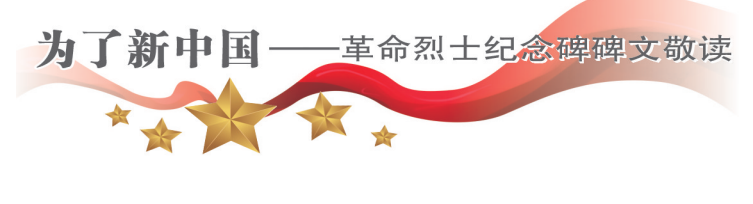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当年既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也是数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毛泽东就曾率红军八进抚州，当行军至抚州广昌县时，他在马上吟出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还有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开展过革命活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无数彪炳春秋的感人事迹，在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态势，诱敌深入，智取抚州、樟树两地。同年12月至次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抚州境内永丰龙岗、宁都东韶两战两捷，第一次反“围剿”宣告胜利。

1931年4月，国民党集结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抚州的广昌、南丰和乐安作为第一红色作战区的地方武装，在东路指挥部的指挥下，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共有6大主要战役，其中5大战役包括乐宜战役、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都在抚州打响。尤



项英给工农通讯员的两封“廉政回信”

□ 钟 军 苏春生

查清贪污腐化事实

李克均出身贫农，兴国县人，1931年入党并进入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后被委任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通讯员。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主席等职。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与乡苏维埃基层工作人员就反腐工作多次书信交流、对话，生动展现了中央苏区严正清明的执政氛围。

经多方调查，终于查清了许文亮贪污腐化的犯罪事实，比如：作为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利用中央政府派他到石城工作之机，他竟把打土豪的金表一只、鞋一双、自来水笔一支，不归公家；又把打土豪来的布，不经财政部长的许可，自行做衣服给他老婆；以财政部名义私自扣留粉干，破坏苏维埃不准做粉干的法令；等等。

4月29日下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根据许文亮等人的错误行为，举行检举运动，对许文亮等人进行公审，发动群众揭发其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错误行为，并决定开除许文亮处长职务。5月2日，《红色中华》报以《两个“宝贝”的公审》一文，对许文亮等人的公审情况进行了报道，并号召苏区群众“我们要以这一例子，来警醒全

其是历时两个月的金资战役，红军击溃国民党6个师，俘虏4000余人。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在此次战役中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率领4个团钳制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亲临前线指挥，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为粉碎第四次“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次反“围剿”成功后，抚州全境有三分之二的区域成为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又在1933年9月纠集100万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主要在抚州境内展开。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使得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严重的困难。开展于抚州南部的广昌保卫战让红军损失尤为惨重，仅在18天的战斗中，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陷入被动境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广昌保卫战也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和消耗战。

抚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无数英雄儿女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抚州这片红土地共有9400余名烈士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时光流转，烈士英魂早已与抚州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成为赣东人民永远的骄傲。



苏区的工农群众，随时揭发各级政府及革命机关内的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官僚主义者，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叫他们一个个滚出苏维埃去！”

换来“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反腐倡廉运动，有力打击了腐败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支援了革命战争，锤炼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群众的监督和检举，为揭露、打击各种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在《红色中华》报公布了许多在中央机关和企业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情况。此外，在群众的检举监督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同有关部门先后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李克均一样的工农通讯员的监督检举和以项英为代表的铁面无私地秉公执法，才使得中央苏区内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都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才有了“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的赞誉。